

张载“蒙以养正”德育思想探究

涂爱荣

(湖北经济学院社会科学系 湖北 武汉 430205)

【内容摘要】北宋理学家张载在道德教育上提出“蒙以养正”的德育思想,强调必须对儿童及时施教和引导、必须对儿童施以正面的教育和引导、必须对儿童施以前后内容一致的道德教育,认为实施“蒙以养正”的德育思想,必须对儿童因材施教,把握道德教育的时机、儿童间的个体差异、儿童的兴趣爱好。张载提出的“蒙以养正”德育思想是符合德育规律的,对我们今天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极富借鉴意义。

【关键词】蒙以养正 德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 B24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2)01-0142-03

一、张载“蒙以养正”德育思想的内涵

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历来注重道德教育,尤其自汉代以来,童蒙教育日渐兴盛,教育者认识到,儿童阶段是一个人道德品质形成的关键期,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尤为重要。如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有过经典论述:“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之为则为,使之止则止。”^[1]到北宋,被称为“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对于童蒙教育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提出了“蒙以养正”的德育思想。“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尚不懂事的孩子,二是指事情的未发状态。所谓“蒙以养正”,是指在儿童尚不懂事时,或儿童思想中错误的价值观念尚未萌发时,即用正确的方法对儿童施以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教育,抓住儿童记忆力强、人格处于塑造期的特点,从小培养其优良品格。这种德育思想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1.必须对儿童及时施教和引导。张载认为,人的道德和行为习惯必须从幼小的时候就予以足够重视,抓住时机,及时引导,先入为主,这样,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就能避免外界不良影响的侵扰。所以他说:“教者但观蒙者时之所及则道之,此是以亨行时中也,此时也,正所谓如时雨化之。如既行之中道而不使之通,则是教者之过;当时而道之使不失其正,则是教者之功。养其蒙使正者,圣人之功也。”^[2]必须把儿童不良的道德习惯消灭于萌芽

状态,及早用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来教育他们,才是成功的道德教育。否则,一旦恶习养成再施教就非常困难了。

2.必须对儿童施以正面的教育和引导。张载指出,对儿童不仅要及时施教,而且要正确施教,即要对他们进行正面引导。他说:“古之小儿便能敬事,长者与之提携,则两手奉长者之手,问之掩口而对,盖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儿,且先安详恭敬。”^[3]显然,张载主张用符合封建伦理道德要求的“敬”、“忠”、“信”等伦理道德规范来对儿童进行教育,这样可以取得良好的德育效果,因为儿童时期性情纯洁,未染恶习,可塑性强,既可能在外界的正面引导和自身的严格要求下养成高尚的道德品质,也可能受外界错误思想的影响而误入歧途。儿童时期也是人一生中接受能力最强、记忆力最好的时期,如果在这一时期没有懂得该懂的礼节,没有培养成为有道德的人,日后随着其地位的变化与智力的增长,只会变得越来越邪恶。因此,在童蒙时期,就应该经常用一些格言至论对他们进行熏陶,使一些善言善行、良好的德育训诫“盈耳充腹”,使儿童在举手投足间,都得到良好的道德熏陶。

3.必须对儿童施以前后内容一致的道德教育。张载主张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时,内容的一致性和过程的一贯性,即要做到善始善终,好恶有常,

* 作者简介 涂爱荣,女,湖北经济学院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当代道德建设。

切忌虎头蛇尾,变幻无常。正如他所说:“教之示以好恶有常,至如不欲犬之升堂,则时其升堂而扑;若既扑其升堂,又复食之于堂,则适孰适从,虽日撻而其不升堂,不可得也。”^[4]如果前后要求或前后内容不一致,是非界限模糊,学生必然无所适从。

二、张载关于“蒙以养正”德育思想的实施方法探索

对于如何实施“蒙以养正”这一德育思想,张载提出须“尽人之材”。所谓“尽人之材”,就是指针对儿童不同的才能、个性、兴趣、爱好等,采用不同的德育方法,施以不同的德育内容,以充分发挥其才能,发展其个性的一种德育方法。他认为教育者在对儿童实施道德教育时,对儿童的熟悉和了解应该像庖丁解牛一样达到“皆知其隙,刃投余地,无全牛矣”^[5]的境界。“尽人之材”实质上是一种因材施教的德育方法,对如何做到“尽人之材”,张载提出三种方法:

1.把握儿童道德教育的时机。把握好施教时机,适时而教,是因材施教的德育方法论题中应有之义。适时而教,即要求教育者对儿童的言谈举止留心观察,把握良好的教育时机,因时施教。这一观点最早出现在《礼记·学记》中:“禁于未发之时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顺。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在此,“未发之时”、“当其可”,都是实施道德教育的良好时机,只有抓住这些最佳时机,适时施教,才可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德育效果,如果错过了教育时机,等到“已发”、“其不可”之时再施加道德教育,则会事倍功半,德育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张载认为对儿童实施道德教育“‘有如时雨化之者’,当其可,乘其间而施之。”^[6]作为教育者,应该充分了解儿童的心理,了解他们有没有接受教育的意愿,而准确、及时地施教:“教者但只看蒙者时之所及则导之,是以亨行时中也,此时也,正所谓‘如时雨化之’”^[5]在此,张载指出不应该超越或滞后儿童的身心发展水平而实施道德教育,他提醒道德教育者,如果不把握好实施道德教育的时机,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教之而不受,虽强告之无益,譬以水投石,必不纳也。今夫石田,虽水润泽,其干可立待者,以其不纳故也。”^[4]这样,就达不到道德教育的目的,不能取得预期的德育效果。

2.把握儿童间的个体差异。张载认为,世界上事物千差万别,人和人在才能、性格、接受能力等方面也是存在着差异的。他说:“某尝谓天下之

物无两个有相似者,虽则一件物亦有阴阳左右。譬之人一身中两手为相似,然而有左右,一手之中五指而复有长短,直至于毛发之类亦无有一相似。”^[7]因此,他提出,在实施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儿童的个体差异,有针对性地进行道德教育,这是搞好儿童道德教育的前提。他指出教育者只有在全面了解教育对象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使其“材”得以充分的发挥,才能做到“尽人之材”,才不至于误人子弟。

3.把握儿童的兴趣爱好。张载认为,了解儿童的兴趣、爱好对于提高德育效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我们今天所讲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而,在实施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儿童的兴趣、爱好,根据他们的喜好,教给他们乐于接受的东西,使之不断进取,提高道德修养。他说:“意乐则易见,急而不乐则失之矣”^[8]相反,如果不考虑受教育者的兴趣、爱好,就如以水浇石田,石田必不能吸水,而且会立即流干,“教之而不受,虽强告之无益,譬之以水投石,必不纳也。”^[4]不可被人接受。张载又进一步指出,如果不顾儿童的兴趣、爱好而盲目施教,对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都是无益的。他说:“施之妄,学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难全哉”^[9]。如果儿童对某一方面没有兴趣,而教育者强行对之加以灌输,其效果可想而知。

三、张载“蒙以养正”德育思想的现代意蕴

张载提出“蒙以养正”德育思想是符合德育规律的,对我们今天加强未成年人尤其是儿童思想道德建设极富借鉴意义。儿童时期是人生成长的关键阶段,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也是思想品德形成的关键期,可塑性强,易于接受外界的影响,正所谓“嫩枝易弯也易直”,所以邓小平同志强调“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品德,要从小开始培养”^{[10](P105)}这一要求是极富战略眼光的。如果在儿童时期不重视道德教育,一旦染上恶习,等长大后就不容易纠正了。儿童道德教育问题不仅事关个人自身的成长,而且涉及国家的发展和前途。

张载提出因材施教的德育方法,其核心是要针对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对症下药,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种方法不仅在理论上是科学、正确的,考虑到了受教育者年龄、个性、接受能力、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多样性,并主张以此为根据实施不同的德育内容,采用灵活多样的德育方法,这是符合思想道德教育规律的。这种德育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德育理论和德育实践仍然有重大的启示

作用。当代教育家鲁迅、陶行知、陈鹤琴等也都极为关注儿童道德教育问题,并提出了比张载的儿童蒙教育方法更为科学的方法。鲁迅先生指出,实施儿童教育时“禁”和“任”都是错误的方法,认为正确的方法来源于教育者对儿童心理的了解,并能够根据儿童的特点教育儿童,最后做到真正的“完全解放孩子”。所以,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正确的方法:一是正确研究儿童;二是正确理解儿童;三是正确指导儿童;四是解放孩子。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把幼儿道德教育看作建国的重要根本,提出了“知情意合一”、“智仁勇合一”、“真善美合一”等具体的途径和方法。陈鹤琴则提出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可以采用比赛的方法、比较教育的方法,另外还要加强师资的培养。这些思想是很有见地的。

儿童道德教育是一项“人心工程”,只有在对儿童充分研究和了解的基础上,考虑他们不同的个性、不同的道德水平,进行有针对性的道德教育,才能使他们自觉地将道德意识转化为道德行动。因此,在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对他们进行充分的研究,细心观察,针对每个儿童的不同特点,有的放矢地进行道德教育,使道德教育尽可能地符合学生实际,避免盲目性。同时,实

施儿童蒙教育,既要有基本的共同的要求,又要善于发现和注意培养儿童的某些特长,适应个体差异进行教育。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在鼓励帮助每个人勤奋努力的同时,仍然不能不承认各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品德差异,并且按照这种差异给以区别对待,尽可能使每个人按不同的条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前进。”^{[10]P106}因此,在思想道德教育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儿童思想道德发展的实际水平,区分层次性,讲求针对性与实效性,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统一起来,对不同的对象提出不同的道德要求。

参考文献:

- [1] 颜氏家训·教子。
- [2] 张载集·横渠易说·上经·蒙。
- [3] 张载集·张子语录·语录抄。
- [4] 张载集·经学理窟·学大原下。
- [5] 张载集·张子语录·语录下。
- [6] 张载集·正蒙·中正篇。
- [7] 张载集·张子语录·语录中。
- [8] 张载集·经学理窟·义理。
- [9] 张载集·正蒙·乾称篇。
- [10]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人民出版社,1994。

(上接第141页)是大型的宫庙基址,礼乐器作为随葬品,棺槨大墓,以酒器、食器等构成的礼器群,以簋、鼓、钟等组成的乐器群、玉质礼器逐渐饰品化,少见或罕见具象造型,图案抽象化等等,这也是后来的中原王朝文化特征,而“非礼乐文化系统”表现为大型祭祀建筑群,祭坛、积石冢、高台墓地、葬玉大墓,流行神像、人物、动物等具象雕刻品,重视视觉冲击,大宗的明器性祭品集中分布等等。且不论述这两个概念的合理性与否,这种中原与周边地区的差别是确实存在的。在龙山晚期,我们可以看到以陶寺城址、石家河城址、良渚城址三座大规模的城址为中心的繁荣景象。此时周边的小城发现也很多,出现了“万国林立”的局面,这种文化分化的状态造成了各地文化的繁荣,及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其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势扩张与辐射,分布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东西达到600千米,南北500千米,受到二里头文化影响的周边文化如江淮的斗鸡台文化、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太湖流域的马桥文化、内蒙古东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这些文化相比之前龙山时期的繁盛状态,都表现出衰落的景象。对于这部分周边的所谓“非礼乐文化系统”文化,笔者认为要区别对待,之前关于祭祀、礼器、政治等诸方面的探讨不能简单的适用于这些地区。在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颛顼的宗教改革”似乎也并没有涉及到这些周边地区,在整个龙山时期,黄河中游地区在经历文化的整合分化,而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仍然表现出显著区别于中原的大宗玉器和祭坛等文化因素。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周边地区的这种

差别?陈冰白先生曾提到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两种模式,一种是中原地区的震荡式发展,一种是海岱地区的稳态发展。中原与周边地区的这种文化差异是否是这种文化发展模式不同造成的抑或是生产方式的不同或地域环境的差别?而在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中,我们也看到了文化的大整合。这种差别的深层原因,目前尚难有一个明确解释。

就中国的文明探源问题而言,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作用要更重于商周考古,以往学界往往以三代作为王朝开端,国家开始,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史前时期的政治体成熟程度可能远高于我们之前的估计。正如陈冰白先生所言,陶寺遗址正如一座没有青铜器、甲骨文的史前殷墟,而青铜器、甲骨文这类现代学者定下的文明标准与古代的实际状况相符吗?我们同样没有在印加帝国发现文字、青铜器,但也从来没有哪位学者质疑过其高度发达的国家政体。

参考文献:

- [1]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M].文物出版社,1986。
- [2]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M].文物出版社,1985。
- [3] 谢端琚.论中国史前卜骨[J].史前研究.(西安半坡博物馆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集)[C].三秦出版社,1998。
- [4] 陈冰白.从龙山晚期的中原态势看二里头文化的形成——兼谈对早期夏文化的若干认识[A].武汉大学历史学集刊(第3辑)[C].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 [5] 陈冰白.谈考古学的文化研究与文明研究[A].武汉大学历史学集刊(第3辑)[C].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